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儒家文化与财务困境恢复**

**——基于“俭”的视角**

|  |  |
| --- | --- |
| 院 系 | **管理学院** |
| 专业班级 | **财务管理1802班** |
| 姓 名 | **王禧月** |
| 学 号 | **U201816465** |
| 指导教师 | **甘煦** |

2022年 4月7日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障、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学位论文管理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省级优秀学士论文评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保密 囗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2、不保密 囗 。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 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它蕴涵的经营管理思想，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各方面都可能产生影响，是促进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俭”逐步发展成为指引着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交的重要导向。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财务困境企业的恢复过程中，除去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之外，类似文化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同样也可能对企业困境的恢复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考察了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俭”的思想，对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的影响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财务困境的恢复。在控制了公司治理变量与城市特征变量之后，我们发现，一定半径范围内儒家书院数目越多的企业，从财务困境中恢复得越快。进一步通过机制分析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中节俭的思想主要通过企业现金流的机制影响财务困境恢复。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困境公司是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儒家文化对财务困境恢复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鉴于文化因素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贞节牌坊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给出了儒家文化支持实业经营、提升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也提出建议，政府部门要提倡并引导儒家文化在公司运营管理中,发挥其在节俭、审慎、自律等方面的功能,提升公司现金流的效率,创造良性的竞争氛围,用儒家文化补足规范公司的缺失。

**关键词：**儒家文化；财务困境恢复；现金流量比率；非正式制度

# Abstract

As the essence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 is also rich in economic management ideas that have influenced all aspects of Chinese economic life and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force for companies to create wealth.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values of Confucian culture, "thrif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action guide in people's daily lif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In today's competitive era, in the process of recovering from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in addi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formal institutions such as culture ma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covery from corporate distres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especially the idea of "thrift"，on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recove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can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recovery of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After controlling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variables and city characteristics variables, we found that firms with a higher number of Confucian temples within a certain distance recovered from financial distress faster.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dea of "thrift" in Confucian culture mainly affects financial distress recovery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corporate cash flow.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to financial distress recovery is more pronounced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iven the problem of endogeneity of cultural factors, our findings still hold after endogeneity tests using chastity pagoda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Confucian culture serves the real economy and improves economic efficiency. It also reveal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and guide the embedding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business management, give full play to its role in thrift, prudence and self-disciplin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cash flow usage, create a favorabl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formal system through Confucian culture.

**Key Words：**Confucianism; financial distress recovery; cash flow ratio; informal system

目 录

[**摘 要 I**](#_Toc104924622)

[**Abstract II**](#_Toc104924623)

[**1 绪论 1**](#_Toc104924624)

[1.1 研究背景 1](#_Toc104924625)

[1.2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3](#_Toc104924626)

[1.2.1 首次研究儒家文化与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关系 3](#_Toc104924627)

[1.2.2 对相关文献进行补充 3](#_Toc104924628)

[1.2.3 给出政策启示 4](#_Toc104924629)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4](#_Toc104924630)

[1.3.1 研究方法 4](#_Toc104924631)

[1.3.2 研究内容 5](#_Toc104924632)

[**2 文献综述 7**](#_Toc104924633)

[2.1儒家传统与企业发展关系 7](#_Toc104924634)

[2.2财务困境的恢复 9](#_Toc104924635)

[2.2.1 财务困境的定义 9](#_Toc104924636)

[2.2.2 财务困境的衡量指标 10](#_Toc104924637)

[2.3 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因素 11](#_Toc104924638)

[**3 假设提出与研究设计 12**](#_Toc104924639)

[3.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2](#_Toc104924640)

[3.2 研究设计 14](#_Toc104924641)

[3.2.1样本选择 14](#_Toc104924642)

[3.2.2 模型设计 15](#_Toc104924643)

[3.2.3 变量定义 15](#_Toc104924644)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17**](#_Toc104924645)

[4.2 回归分析 18](#_Toc104924646)

[4.3 稳健性检验 21](#_Toc104924647)

[4.4 内生性检验 24](#_Toc104924648)

[4.5 拓展研究 25](#_Toc104924649)

[**5 结论与启示 28**](#_Toc104924650)

[5.1 结论 28](#_Toc104924651)

[5.2 启示 28](#_Toc104924652)

[**致谢 30**](#_Toc104924653)

[**参考文献 31**](#_Toc104924654)

#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变化多端的经济环境中，所有上市公司都会面对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有的企业能够利用机遇、规避风险而获得利润与成长; 但也有一些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或缺乏竞争力而面临财务危机，甚至面临倒闭。企业一旦出现财务危机，不仅会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作，也会影响到股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经济利益。在此背景下，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摆脱财务困境的因素进行分析，为其提供相应的对策，使其早日走出困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已有文献从营业收入增长率、每股净资产、流动资产周转率（尹斌，2012）、宏观经济形势（董保国，2009）、政治关联、银行关系（姚珊珊和沈中华，2016）、继任高管的专业背景（姚珊珊，2015）以及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金洁，2014）等多个视角研究了影响企业财务困境的主要因素。但这些研究在考察财务困境面临的约束时，大部分是站在制度层面，并且考察的多是显性的机制约束，却很少考虑到社会文化等隐性的因素或者说价值规范，对财务困境的产生，以及对困境对象的策略偏好及抉择的影响。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amuel P. Huntington & Carey Harrison，2013）。从近年来流行的行为金融研究中，我们发现，除去体制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其他的非正式制度，比如文化，也会对企业的运作有很大的影响（Li et al.，2013）。尤其是对我国这样的一个虽然文化非常悠久，但市场经济的机制、制度仍有待完善的国家，文化因素这一类非正式的制度可能起着愈加不可轻视的作用( Allen et al.2005; 陈冬华等，2013) 。陈冬华等(2013) 以及Allen (2005)都认为，要解决我国转型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不仅要考察我国从外部借鉴、改革得到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更加不能忽视随着时代发展由我国内部逐渐发展而成的非正式公司管理制度。

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影响一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影响他的行为举止，进而对整个社会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传统文化既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员工与高管，从而对企业治理产生影响，也能够间接地通过影响商业伦理来影响企业的治理。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抹瑰丽的色彩，也是我国悠久的社会历史中一颗闪耀的星。根据历史记载，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最早的儒家学说，他提出并倡导“仁”与“礼”，同时捍卫周礼。到了战国，儒学的进一步传承则交到了孟子等人的手中（李金波和聂辉华，2011），他提出了仁政、“民贵君轻”等著名的言论。从汉武帝以后，儒学成为了被统治阶级当作树立规范、维护稳定的社会治安的手段(任继愈，1980) 。具体来说，“三纲五常”是儒家学说这套道德伦理的概念性架构。即使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儒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教的一定冲击，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且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仍然非常需要这种道德准则。至宋代，儒学兴起（张君劢，2006)，至明清，儒教鼎盛（杜维明，2012）。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儒家思想具有很深的基础，是民间“日用而不知”的道德规范（许纪霖，2014）。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儒家文化形成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与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石，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正式体制。它不但决定了中国公司的文化内涵，也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支撑(杜维明，1997、2003) 。文化影响的变化特别缓慢，中国作为一个结束封建社会不算久的国家，它的影响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当代的经济社会。同时，儒家文化的精华能够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需求完美契合，对现代企业的经营有指导意义。所以，奉行“俭”、“信”、“仁”等儒家文化的显著因素，在当代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对“文化自信”的弘扬。当然，并非只有政府机构意识到了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在文化、经济、金融等学科交叉研究的快速发展下，以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公司的金融行为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众所周知，“俭”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价值观念之一，从儒家学派兴起时就存在，又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广，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交中重要的行动指引。“俭”既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也是我国流传千年至今的良好美德。在这样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中国人一贯奉行“克勤克俭”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通过对员工的思想方式进行影响，进而对公司的经营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俭”文化作为一种根植于我国价值观的文化理念，它很有可能被巧妙地纳入公司的商业决策中。在公司财务特征中，与“俭”的价值概念联系最紧密的是公司现金流的使用。对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公司来说，“俭”的思想的影响可以推动其对铺张浪费行为的克制，进而增加企业的现金流比率。此外，在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资本市场也自发地塑造了道德要求，使企业“勤俭节约”，“以义取利”。在当今中国资本市场，企业更加重视声誉的影响，这会对企业现金流的使用产生更大的约束作用。

当代中国人对于节俭观念的推崇并不是刚刚兴起，而是在新的时代与环境下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公众更加重视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的美好风尚。近年来，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人民，都在主动地践行勤俭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

儒学是我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管理思想，必将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行深入的探究，尤其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它对企业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探究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以儒家文化中“俭”的视角出发，探讨这种影响具体的传导机制，来考察非正式制度是如何通过从微观层面影响企业进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

1.2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根据论文的背景和问题，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和意义为：

1.2.1 首次研究儒家文化与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关系

本文首次研究了儒家的俭文化对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对我们所提出的假设进行证实，即儒家文化是否对企业财务困境的恢复产生影响，并从“俭”的视角出发探究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公司的财务指标、治理结构等，但是财务困境的恢复不应仅仅是财务因素决定，目标公司的文化环境也应该被考虑在内；

1.2.2 对相关文献进行补充

我们的研究主题较为新颖，可以丰富该主题的研究文献。从研究视角来看，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较为新颖。近年来较流行的行为金融学认为，不仅有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运作，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国内外对文化因素的测度和研究还不完善，对于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困境的研究更是罕见。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发展以及财务困境恢复的相关文献进行有益的补充。现有文献很少对这两个变量的关系进行探究，我们希望对它进行初步探索；

1.2.3 给出政策启示

基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并不鲜见，而恢复状况又存在差异的情况，以及经济发展会受到思想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给予困境企业一定的政策启示，启示已经陷入困境以及还未陷入困境但遭遇挫折的企业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为提高我国公司财务困境的恢复能力提出实证建议。深入考察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尤其是从微观角度出发探讨儒家文化在助力企业走出财务困境、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3.1 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基于现有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和模型，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儒家文化如何在财务困境恢复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1）理论研究法

本文首先对儒家文化与企业财务困境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归纳，以研究目前关于儒家文化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之处；然后，根据整理的资料，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方法；

（2）实证分析法

在实证研究上，本论文既采取了定性，又采用了定量的方法，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整理与阐释，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依据与理论框架。本研究首先采用国泰安资料库，收集上市公司2010-2020年度财务数据，并使用《统计年鉴》收集有关儒家文化的资料，然后用Stata统计软件对提出的模型进行检验；探讨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速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以企业现金流比率代表的“俭”的思想对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比如替换变量、剔除特殊变量、分组回归、剔除行业效应等。最后，使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1.3.2 研究内容

本文从传统文化角度切入，基于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流派—儒家文化探讨企业中的儒家文化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儒家文化中“俭”的思想分析其作用路径。

本文首先研究了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是否会对财务困境的恢复发挥作用，然后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通过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筛选出了符合条件的195家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财务数据，借鉴 Edward Altman（1968）教授的 Z-score 模型计算各公司在这10年间财务困境恢复的平均时间，又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手工整理出宋代至清代存在于全国各地、且现在仍有记载的儒家书院的校名和地理位置，并且利用百度地图搜索到每个孔庙的经纬度坐标，根据以上信息测算出他们与样本企业办公地经纬度坐标之间的地理间距。

用 Stata 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检验后，我们发现，样本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时长与该公司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儒家文化的影响确实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普遍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样本检验中，我们发现国企上市公司的儒家文化影响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相对更为明显。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参考马若微等（2015）并结合理论分析，我们用企业现金流量比率作为代理变量，以体现儒家文化中的“俭”的思想。通过Stata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财务困境恢复期间现金流量比率越大；而通过理论探讨，我们认为现金流比率能够很好地体现企业受到“俭”的观念的影响程度，是节俭思想的良好量化指标。这可能意味着，儒家文化中“俭”的思想通过提高企业的现金流比率对财务困境的恢复产生促进作用。

基于此，全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已有的关于财务困境以及其恢复的实证研究进行综合性评述，介绍有关的理论，从财务困境的概念、原因和特点、恢复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入手，并在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对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整理和归纳。

第三章是假设提出与研究设计。本文根据第二章整理的文献，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基于儒家的主要思想与本文的研究问题提出了两个主要假设；其次，本文详细地列出了我们的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以及模型设定。

第四章列出了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且对结果进行分析解释。本文认为，儒家文化的熏陶确实促进了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恢复，并且现金流量比率作为“俭”思想的量化指标是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的主要假设由此得以验证。此外，我们采取不同的控制变量对回归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设置工具变量对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佐证了我们研究的可靠性。

最后为结束语部分,对报告的结果做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具体的对策意见;同时,对该论文的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做出了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 2 文献综述

2.1儒家传统与企业发展关系

不同的观点对企业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Jensen & Meckling (1976)认为，企业是一种与很多机构相似的，由法律编造、虚构出来的机构，它就像是一条条纽带，为个人之间创造一系列的契约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是指劳动者、物资的提供者、商品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也代表着企业不只是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经济单位，还是将个人、组织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所以，企业不仅具有经济职能，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职能。公司文化是这一社会职能的一种重要形式。企业文化是公司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通过实践产生的集体的思想意识与职业观念的总和，它是社会和组织实践运作的结果，是公司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管理方式，为公司成员带来吸引力和凝聚力，可以结合许多人的利益、目标、需求和行为，也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体现。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些文化则以其哲学思考引领着人类走向了现代文明。各种权威性的观点争相涌现，尤其是儒家学说，更是与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儒学的思想体系蕴含着丰富而又精辟的经营智慧，这些妙语，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都能历久弥新，至今仍能启发后代，并对今天的公司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举例来说，孔子“义利观”在中国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儒家学说的经典文章中可以看出，“义”和“利”不是完全相对的。虽然儒家的开创者孔子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他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因此，孔子虽然很重视“义”，但他认为，“义”和“利”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是可以被合理追求的。

而且，“诚信”这一思想在儒家思想中被屡次提及，又被称为人们的“修身之本”，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诚信是一个人的根基，缺少诚信，就会一事无成。同样的，市场经济运作的规模与效率也离不开良好的信用体系，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诚信也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儒学对“仁爱”思想十分重视，《论语》中“仁”的思想就是提倡、传播仁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必须把“仁”的思想观念纳入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之中。要想使公司得以长久、健康地发展，就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融入“仁”的思想，以仁爱之心对待员工，关爱员工。要想留住人才，企业就要以员工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必须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注重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兼顾到员工的物质与心理需求。

最后，儒家文化中还重视“反求诸己”的观念，注重自我教育，注重自我的自省、自强和自我约束，当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先以自我为出发点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企业发展之路上，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困难与坎坷，并非都会一帆风顺，而许多企业经营者在剖析失败原因时，常常将其归咎于外在环境，而忽视了问题根源可能是企业本身。倘若企业管理者不能从自身的某些方面找出一些问题，使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最大的作用，也无法建设完整的制度来调度物资与人才，就可能频繁出现经常性的、反复性的问题。若遇到问题多从自身找原因，从完善自身的因素和制度设计等方面入手，就能更好地促进矛盾的化解。

最近几年，由于金融经济领域中的文化研究迅速发展，儒家文化如何影响现代商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这一类的话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发现，儒教文化对公司的创新行为有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受儒家思想影响愈深，其专利产出水平相应地也会愈高。具体而言，这样积极的影响有着三方面的传导方式：减轻企业代理问题与矛盾冲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并且降低专利方面的侵权风险。古志辉（2020）以位于公司所在地200公里以内的儒家书院为度量标准，结果显示，具有较高儒家文化水平的区域，公司的代理成本较低。从实证分析来看，儒家伦理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可以抑制大股东利用现金红利谋取私利，又可以提高其通过法律手段参与公司治理的效率。李鑫（2020）研究得出，在儒教文化较为浓厚的地方，大股东参与“掏空”的行为较少。程博（2016）研究了儒家文化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作用，证明了儒家文化在改善企业信息环境、促进合同执行、提高公司治理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程博（2018）等人进一步指出，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信”与“自律”，可以有效地遏制公司违法行为。金智等（2017）发现，儒学文化对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很大的影响。总体上，企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愈深，其承担的风险程度愈低。在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区域和私营企业中，这种关联性比较薄弱。王艳艳和叶陈刚（2021）认为，儒家文化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用的提升都有一定的作用，并由此对公司的盈余管理发挥作用。李彩玲和林东杰（2019）的调查结果显示，高管更倾向于儒家文化的公司，法律风险和诉讼风险会相对较小。王兴元（2021）认为，孔子的创新创业理念能够为当代公司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加清晰的目标导向和精神支柱，可以提供更多的成长与发展机会、加强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并且为当代创新创业教育注入丰厚的精神营养。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儒家文化依然是一种有效的非正规的管理机制，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有助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2.2财务困境的恢复

2.2.1 财务困境的定义

财务困境又称财务恶化或财务失败，是指企业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典型表现如经营受阻、资金断裂、无力偿债、连年亏损等，最严重的结果是公司破产。

想要对公司何时陷入财务困境进行预测，首先要确定认定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准。关于财务困境的认定，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在国外， Beaver （1966）把陷入财务困难的标准界定为“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并进一步把债券违约、优先股股利偿付困难、破产等归类为财务困难；Camikel（1972）将财务困境的定义扩展到“公司不能及时偿还债务”；Ross （2000）将企业、会计、法定和技术这四类破产称作财务困难；Tinoco & Wilson （2013）相信，如果公司在两年内发生“利息、所得税和摊销前利润”低于利息支出和市值下降，那么就会被视为财务困难。在我国，陈静（1999）以“ST”为代表的公司为研究对象；陈晓和陈治鸿（2000）排除了“因为其它异常情况进行特别处理”的样本，只对“因为财务异常情况而进行特别处理”的样本予以保留；章志旺（2008）超越了基于 ST的判断，将范围扩大到了债务违约的范围，将其定义为：“由于资金短缺，拖欠了大量的短期贷款，或者有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张金昌（2012）从融资链条的观点，提出了“由于资金供应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从而使企业不能正常运营”。

在该领域早期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选择将某一种静态的状态作为标准，例如，学者在早期的经验研究中，往往把“破产”与“陷入财务困境”看作相同的概念。这种标准虽然便于选取样本，然而逐渐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破产更加体现其在法律层面的意义而非经济实质，且还存在如下问题：

1）破产需要执行一段时间的法律程序，其正式宣告破产的时点与其陷入财务困境的时间存在间隔；

2）破产是一种最极端的后果，但从实际来看大多数企业是有重回正常经营状态的可能的；

3）破产实质是一种法律概念，而非经济概念，不同国家对这一法律概念的认定标准不同，缺乏可比性，因而影响到预测模型在不同国家中的可拓展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探索更加贴合企业经济实质的标准，不少学者跳出孤立、静态的视角，开始采用全面、整体的视角，对陷入财务困境的全过程进行研究。例如，张金昌（2020）对以往学者的研究做了精炼的总结，他认为此前界定的不同标准，诸如资金紧张、支付困难、债务违约、破产清算等，实质上都是企业财务困境的整体演变状态中的部分环节，它们之间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关联关系。该理论将此前不同学者对认定标准的不同理解纳入到同一框架之下，并由此提出建议，认为可以将财务困境的预测理解为对整个动态发展过程的预警，该过程的起点是资金紧张，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要在重点聚焦资金供求平衡关系的前提下，分阶段地构建财务困境模型；这些观点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2.2.2 财务困境的衡量指标

在实证研究中，财务困境通常使用Edward Altman (1968）教授的 Z-score 模型：

𝑍 = 0.012𝑋1 + 0.014𝑋2 + 0.033𝑋3 + 0.006𝑋4 + 0.999𝑋5

其中 X1 为(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X2 为留存收益/总资产，X3 为息税前收益/总资产，X4 为优先股和普通股市值/总负债，X5 为销售额/总资产; Z-score模型的判断标准为:若Z<1.81,则企业处于破产区，即该公司将破产的概率较大;若1.82<X<2.675,则企业处于灰色区域，表示该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太稳定，也有一定的破产可能性；若X>2.675,则企业处于安全区,即该公司只有很小的可能会破产;

在他的研究中，Z score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高达 97%。之后，Collins（1980）、 Prandtl & Patterson（1994）等对财务困境预测方面的研究也都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2.3 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因素

尹斌（2012）运用逻辑回归模型，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企业财务困境状况好转的主要因素有：营业收入增长率、每股净资产、流动资产周转率、是否更换高管；董保国（2009）认为，公司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宏观经济状况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改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发展能力与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企业的经营水平、高管的变动、财务困境恢复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姚珊珊和沈中华（2016）从政治关系、银行关系等角度探讨了在危机中银行获得银行信贷及摆脱财务困境的影响。在国有的经济困难的企业中，只有政治联系才能使公司脱离财务危机，而在非国企中，与政治联系相比，银行关联更具有普遍性、效率更高。姚珊珊（2015）进而考察了在管理层变动的样本中，继任者的专业背景和“关系”对财务困境恢复的作用。金洁（2014）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均衡程度对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的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宁（2020）以经理人过分自信为切入点，探讨了经理人的心理偏差对企业的财务困境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马若微等（2015）认为，公司困境状况的改善主要是受财务状况和企业治理状况的影响。雷康弘（2015）指出，目前国内有关企业财务危机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的财务预警上，而关于企业如何走出财务危机，还需进行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的验证。

# 3 假设提出与研究设计

根据文献综述，本文对研究问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我们参照现有的文献，对本文的主要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此章中列示了实证的研究方法。

3.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高阶理论与烙印理论指出，企业家的个人认识与价值取向会受到其生长环境与文化土壤的影响，并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得以反映（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通过对儒家经典著作中有关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论述和思考，笔者提出了如下的理论和设想：

在众多中华传统文化中，常常以儒家思想为最主要的代表，其影响范围最广、最深远，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本哲学体系、价值观体系、道德伦理准则。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就被统治者所推崇，并在其基础上确立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特别是在元、明两代，儒学的四书五经成了科举的唯一参考书，这就表明，儒家文化不但具有底层大众的基础，而且是官方认可并推崇的思想观念。在封建统治阶层的长期推动下，儒家文化在悠久的历史征途中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为从平民到精英阶层“日用而不自知”的行为准则。正如前面提到的，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的变迁是非常缓慢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尚短，即便是在近代的商业社会里，儒家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等儒家思想，始终是我国人民平常生活中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另外，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也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它还会对商业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多是通过影响商人的思想观念而间接形成的。长久以来，“贾而好儒”是中国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所显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特征，它体现在：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以义取利”、“以义为利”、“诚信之德”、“真善为本”、“以德治商”等良好的品德，而“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这是中国商人无法接受的一种伦理评价。

近年来，由于金融经济领域中的文化研究迅速发展，儒教文化如何影响现代商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儒家文化依然是一种有效的非正规的管理机制，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有助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其实，除了大股东掏空、内部控制等问题外，企业的财务困境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架构，考察了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作用，虽然在财务困境方面的研究已经颇有成就，但依然有很多研究忽视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正如陈冬华等人所说，要想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光靠中国近十年来所学习和改进的西方体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从中国的深厚文化中找到答案。在解决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上，儒家文化在企业中树立了“节俭”的价值观，在经济市场上推行“勤俭节约”等道德伦理期望的同时，也能有效地抑制企业的现金流浪费，从而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加速企业的经济复苏。本文主要从以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儒学所提倡的“节俭”观念能够对企业经营者的工作消费行为形成内在的制约。在儒家思想观念的熏陶下，中国人历来崇尚“仁、义、礼、智、信”，节俭作为一种美德是我国几千年来一直遵循的行为准则。论语中说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诸葛亮也曾写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名言中我们也能窥探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节俭态度，以及对物质的低追求。由此可以推测，越是具有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人们就会越容易养成节俭、拒绝铺张浪费的习惯。而作为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公司，其日常生活习惯也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表现为企业更加充足的现金流。

其次，儒学文化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道德氛围，从而对公司的经营行为产生外在制约。这种伦理约束，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集体意识，即在一个具有较强儒家文化氛围的地方，一般人会比较“勤俭节约”，以日常行为来传承传统美德。在这样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种道德上的需求并施加给当地的企业，即企业要贯彻“俭”的价值观念。受儒学文化的熏陶，人们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中，必然会产生“以义制利”、“取财有道”的观念。而合法获取的现金流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为公司创造增值，从而形成有利的公司资源，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正面的积极影响。

所以，从这两点出发，节约公司的现金流既符合了“节俭”的传统，又满足了股东的利益，这显然与资本市场对公司的道德期望相协调。因此，在具有较强儒家文化的地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公司也会在现金流量上减少不必要的支出。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儒学所提倡的“节俭”观念和资本市场中儒家文化所形成的伦理约束，将会促进公司减少对现金流的支出，加速经济复苏。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儒家文化对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恢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在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区，财务困境企业恢复的速度越快。

假设2：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促进作用的传导机制为企业现金流比率。即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的公司会有更加充足的现金流，或者现金流的使用更加高效，从而有助于企业财务困境的恢复。

作为补充，以下儒家文化中的其他思想也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支持：

儒家的风险规避主义、集体主义有助于企业减少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投资，有利于企业在困境时期规避高风险项目，加速现金流周转的恢复。

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忠信”道德价值，是一种隐含的制约机制，它在减轻代理冲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志辉，2015)，从而减少了对财务困境恢复的障碍。

儒学中提倡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如名言中所提到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 卫灵公》)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易经·系辞》) 。这种居安思危的高瞻远瞩，会激励企业家积极进取、开拓进取的精神，使其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反求诸己”要求企业在面对问题或困境时，首先从自己的视角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有利于企业从改进自身因素、完善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处理，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和冲突，促进财务困境的恢复。

3.2 研究设计

3.2.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并且利用python、excel等工具，按以下几条准则对数据进行筛选: 首先将金融行业的企业、由外资控股的企业以及有数据缺失的企业排除，再选出符合困境恢复研究条件的公司（具体参见变量定义），最后筛选出 195 个样本公司。企业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和WIND数据库。与儒家文化相关的数据由手工搜集整理而成（具体参见变量定义）。

3.2.2 模型设计

具体的模型建立如下：

3.2.3 变量定义

1）儒家文化：本文以古志辉（2015）和徐细雄等（2019）的研究为借鉴，以儒家书院的分布密度为指标，测度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强度。手工整理出宋代至清代各地儒家书院的名称和地址。然后，利用百度地图搜集书院的经纬度坐标，并计算出与上市公司办公地经纬度坐标之间的地理距离。用公司办公地 200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儒家书院数量（Lnkm200，取对数），来度量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若书院分布在企业办公地周围一定半径范围内的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公司受到的儒家文化影响越深。

2）财务困境恢复：借鉴 Edward Altman（1968）教授的 Z-score 模型（详见下文），在数据库中选取沪深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 2010-2020 年的 Z 值，并按照上文中的分类标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公司数据（10 年中未经历过财务困境，或困境还未恢复过，或反复陷入困境等），并计算各公司在这 10 年财务困境恢复的平均时间（以年为单位）。数据处理过程用到python、stata、excel等工具。

Z-score 模型：

Edward Altman (1968）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对其选取的二十二个财务指标进行数据分析与重组，选出如下几个解释变量，由此形成了著名的 Z-score 模型：

𝑍 = 0.012𝑋1 + 0.014𝑋2 + 0.033𝑋3 + 0.006𝑋4 + 0.999𝑋5 （3-2）

模型中具体变量定义及计算方式见文献综述部分对财务困境的界定。

本文借鉴该模型，在上述数据库中选取了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0-2020 年的 Z 值，并按照上文中的分类标准剔除不符合要求的公司数据。

3）控制变量

（1）公司特征变量：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两职合一情况、独立董事占比等。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具体定义如下变量定义表。

（2）地区特征变量：书院数量这一度量标准虽然可以反映某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但可能其中还会反映那一段时期不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情况，也就是说，书院的数据可能还会因为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间接地对当地公司的财务困境恢复状况造成影响。如果忽略了这些数据，可能会造成本文的估计出现偏差。因此，我们选取了几个代理指标纳入到模型中，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司所属城市的人均 GDP；所属城市是否为省会城市(CapCity)；所属城市的教育水平(Uni，等于所属城市高等院校数加一再取对数)。

我们的变量定义如表 3-1所示：

表3-1 变量定义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名称 | 变量定义说明 | | | | |
| Lnkm200  Lnkm300  Recovery  Cashflow  Growth  Indep  Duality  GDP  CapCity | 衡量儒家文化影响，等于距公司注册地 200 公里以内孔庙数量加 1 的自然对数  衡量儒家文化影响，等于距公司注册地 300 公里以内孔庙数量加 1 的自然对数  衡量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速度，等于各公司近十年困境公司恢复困境所需时间  现金流比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本年末营业收入-上年末营业收入）/上年末营业收入  独立董事占比，独董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二职合一=1，未合一=0  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GDP  公司所在城市是否为省会城市，是=1，否=0，直辖市及自治区=1 | | | | |
| Uni  Degree | 公司所在城市教育情况，等于公司所在城市高校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公司高管的教育背景，参考CSMAR数据库中的划分标准，计算出的样本公司高管学历水平的平均数 | | | | |

#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第三章中提出的假设和研究设计，在本章中我们列示了实证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了解读。实证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即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企业财务困境的恢复造成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且公司现金流比率是该影响的作用机制之一。4.1 描述性统计

表4-1 基本变量描述性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 VARIABLES | N | Mean | SD | Min | Max |
| Recovery | 195 | 2.256 | 1.698 | 1 | 9 |
| Lnkm200 | 195 | 2.320 | 0.810 | 0 | 3.829 |
| Growth | 195 | 0.187 | 0.554 | -0.732 | 3.591 |
| Indep | 195 | 0.368 | 0.0501 | 0.308 | 0.571 |
| Duality | 195 | 0.195 | 0.397 | 0 | 1 |
| Gdp | 195 | 9.973 | 4.288 | 4.090 | 18.39 |
| CapCity | 195 | 0.451 | 0.499 | 0 | 1 |
| Uni | 195 | 2.439 | 1.783 | 0 | 4.533 |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列示在上表4-1中。儒家文化（Lnkm200）的均值为 2.320，方差是0.810，最大值为3.829，最小值为0。这表明样本中的企业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程度各有不同，为本文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场景。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的均值为2.262，方差是1.698，最大值为9，最小值为1。这意味着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从困境中恢复所需时间差别较大、各公司恢复能力存在差异。

对于控制变量，其中公司特征变量层面，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均值为0.187，方差为0.554，最大值为3.591，最小值为-0.732，说明各公司营业收入情况存在差异。独立董事占比（Indep）均值为0.368，方差为0.0501，最大值为0.571，最小值为0.308，说明各公司董事情况存在差异。两职合一（Duality）均值为0.195，方差为0.397，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说明各公司两职合一情况存在差异，且大部分公司并没有两职合一；地区特征变量层面，人均GDP均值为9.973，方差为4.288，最大值18.39，最小值4.09，可以看出，样本公司所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省会城市（Capcity）均值为0.451，方差为0.499，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可见样本公司中有接近一半处于省会城市。教育水平（Uni）均值为2.439，方差为1.783，最大值为4.533，最小值为0，说明各公司所在城市的教育水平差异较大。

**4.2 回归分析**

表4-2 基准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 Recovery | Recovery | Recovery |
| Lnkm200 | -1.703\*\*\* | -1.707\*\*\* | -1.510\*\*\* |
|  | (-19.38) | (-19.20) | (-15.29) |
| Growth |  | -0.0704 | -0.0564 |
|  |  | (-0.54) | (-0.45) |
| Indep |  | -1.482 | -1.627 |
|  |  | (-1.03) | (-1.18) |
| Duality |  | -0.139 | -0.118 |
|  |  | (-0.77) | (-0.68) |
| Gdp |  |  | -0.0129 |
|  |  |  | (-0.75) |
| CapCity |  |  | -0.210 |
|  |  |  | (-1.22) |
| Uni |  |  | -0.144\*\*\* |
|  |  |  | (-2.75) |
| \_cons | 6.208\*\*\* | 6.803\*\*\* | 6.967\*\*\* |
|  | (28.74) | (11.62) | (12.03) |
| *N* | 195 | 195 | 195 |
| *R*2 | 0.660 | 0.664 | 0.698 |
| adj. *R*2 | 0.659 | 0.657 | 0.687 |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调整后的 ｔ 统计量； ∗ 、 ∗∗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 、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2从整体上展示了儒家文化对财务困境恢复的回归结果。分别来看，列（1）显示的是单变量的回归结果，代表儒家文化的变量Lnkm200与代表财务困境恢复的变量Recovery，它们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基本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1，儒家文化对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恢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随后，列（2）现实的是本文在增加了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3）则是在前面的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的又一次回归结果。 总体回归结果表明，在设置公司层面、城市层面这两类控制变量前后，儒家文化（Lnkm200）与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的回归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4-2的数据从整体上证明，公司所在地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越强，该公司的财务困境恢复时间越短，我们的假设1进一步得到了验证。

表4-3 机制检验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 Cashflow | Cashflow | Cashflow | Recovery |
| Lnkm200 | 0.0466\*\*\* | 0.0460\*\*\* | 0.0459\*\*\* |  |
|  | (7.34) | (7.16) | (7.11) |  |
| Growth |  | 0.00211 | 0.000965 |  |
|  |  | (0.22) | (0.10) |  |
| Indep |  | -0.0544 | -0.0633 |  |
|  |  | (-0.52) | (-0.61) |  |
| Duality |  | -0.0192 | -0.0209 |  |
|  |  | (-1.47) | (-1.60) |  |
| Gdp |  |  | 0.00248\* |  |
|  |  |  | (1.76) |  |
| CapCity |  |  | -0.0125 |  |
|  |  |  | (-0.97) |  |
| Uni |  |  | -0.000417 |  |
|  |  |  | (-0.11) |  |
| Cashflow |  |  |  | -0.0255\*\*\*  (-8.82) |
| \_cons | -0.0576\*\*\* | -0.0328 | -0.0467 | 0.108\*\*\* |
|  | (-3.69) | (-0.78) | (-1.06) | (13.24) |
| *N* | 195 | 195 | 195 | 195 |
| *R*2 | 0.218 | 0.229 | 0.247 | 0.287 |
| adj. *R*2 | 0.214 | 0.213 | 0.218 | 0.283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为了进一步探讨传导机制，参考马若微等（2015），我们用企业现金流量比率作为代理变量。根据 Kane等（2006）的财务数据分析，发现与现有的存量信息相比，流量信息更能代表公司的摆脱困境的能力。并且参考儒家经典，我们认为现金流的使用能够很好地代表公司受到儒家文化中“俭”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程度。于是我们用现金流量比率代替财务困境恢复，进行回归（如表4-3列3），结果表明，现金流比率（Cashflow）与儒家文化影响（Lnkm200）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公司所在地区儒家思想的氛围越浓厚，企业现金流量比率越大，更有利于财务困境的恢复，与本文假设2基本相符。

为了检验企业流量信息对财务困境恢复的反映，我们对企业现金流量比率（Cashflow）与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进行回归（表4-3列4），发现二者呈显著负相关，为我们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表4-4 交互项检验

|  |  |  |
| --- | --- | --- |
|  | (1) | (2) |
|  | Recovery | Recovery |
| thrift | -4.287\*\*\* | -2.978\*\*\* |
|  | (-8.10) | (-5.73) |
| Growth |  | -0.212 |
|  |  | (-1.24) |
| Indep |  | -1.164 |
|  |  | (-0.61) |
| Duality |  | -0.264 |
|  |  | (-1.09) |
| Gdp |  | 0.0254 |
|  |  | (1.07) |
| CapCity |  | -0.569\*\* |
|  |  | (-2.42) |
| Uni |  | -0.309\*\*\* |
|  |  | (-4.37) |
| \_cons | 2.877\*\*\* | 3.965\*\*\* |
|  | (22.09) | (5.35) |
| *N* | 195 | 195 |
| *R*2 | 0.254 | 0.422 |
| adj. *R*2 | 0.250 | 0.401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进一步地，为了更好地证明儒家传统中“俭”文化对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我们采用交互项，将原有变量儒家文化（Lnkm200）与现金流比率（Cashflow）相乘生成新的变量thrift，与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4 ，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儒家文化中“俭”的思想单独对企业财务困境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3 稳健性检验**

表4-5 稳健性检验（1）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  | Recovery | Recovery | Recovery |
| Lnkm300 | -2.336\*\*\* |  |  |
|  | (-16.49) |  |  |
| Lnkm200 |  | -1.625\*\*\* | -1.489\*\*\* |
|  |  | (-15.09) | (-11.38) |
| \_cons | 8.808\*\*\* | 6.092\*\*\* | 5.687\*\*\* |
| 控制变量 | (21.75)  Yes | (22.89)  Yes | (17.42)  Yes |
| *N* | 195 | 190 | 149 |
| *R*2 | 0.585 | 0.548 | 0.468 |
| adj. *R*2 | 0.583 | 0.545 | 0.465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第一，替换自变量。参考古志辉（2020），本文替换了儒家文化的度量指标中区域的半径，将原来的200公里换成公司办公地300公里半径内的孔庙数，并与之前一样取其对数（Lnkm300），以此当作儒家文化的衡量指标，用模型3-1再次回归。回归的结果列示在表（4-5）列（1）中，更换后的自变量（Lnkm300）系数为负，并且仍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将儒家文化指标进行更换之后，假设中儒家思想对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依然成立。

第二，剔除少数民族样本。鉴于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地域有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民俗文化与思想观念，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相对不稳定，因此我们筛掉了新疆（1个）、西藏（2个）、内蒙古（2个）等地区的样本，再次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列示在列（2），儒家文化（Lnkm200）仍与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呈显著的负相关。

第三，剔除一线城市样本。鉴于北京（16个）、上海（18个）、广州（3个）、深圳（9个）四个一线城市的上市公司的数目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远高于平均水平，由于地理集聚、城市国际化等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属性存在较大的系统性差异，从而可能对回归分析产生干扰。因此，本文排除处于上述城市的公司，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列示在表（4-5）列（3），可见解释变量Lnkm200仍在原有的显著性水平上系数为负。

表4-6 稳健性检验（2）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  | Recovery | Recovery | Recovery | Recovery | Recovery |
| Lnkm200 | -1.570\*\*\* | -1.631\*\*\* | -1.637\*\*\* | -1.758\*\*\* | -2.299\*\* |
|  | (-4.03) | (-10.51) | (-11.25) | (-5.04) | (-2.84) |
| \_cons | 5.891\*\*\* | 6.115\*\*\* | 6.137\*\*\* | 6.222\*\*\* | 7.401\*\*\* |
| 控制变量 | (5.55)  Yes | (14.70)  Yes | (15.73)  Yes | (8.03)  Yes | (3.45)  Yes |
| *N* | 22 | 173 | 187 | 12 | 21 |
| *R*2 | 0.556 | 0.549 | 0.561 | 0.676 | 0.449 |
| adj. *R*2 | 0.534 | 0.546 | 0.558 | 0.643 | 0.420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第四，考虑到本文因变量财务困境恢复采用的Z-score的原始版本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主研究得出，尽管后人研究出了修正版，难免会受到行业效应的干扰。因此，本文以行业为分类做了进一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6 。在本文的样本公司中，我们挑出属于制造业企业的样本单独回归，如列（1），又将剩下的除制造业以外的样本回归，如列（2），结果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然后我们将搜集的上市公司Z-score（除金融保险类等）按19个不同行业分别算出中位数，行业分类参考CSMAR数据库最新分类标准。剔除样本的所有行业中Z-score中位数最大及最小的行业，重新回归，结果如列（3），仍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最后，由于样本总数不大，我们挑出两个样本相对大的行业：批发零售业与房地产业，进行单独回归，显著负相关的结论仍然成立。

表4-7 稳健性检验（3）

|  |  |  |
| --- | --- | --- |
|  | (1) | (2) |
|  | Recovery | Recovery |
| Lnkm200 | -1.626\*\*\* | -1.348\*\*\* |
|  | (-15.32) | (-11.49) |
| Degree | -0.141 | -0.179 |
| 控制变量 | (-0.51)  Yes | (-0.67)  Yes |
| \_cons | 6.624\*\*\* | 6.903\*\*\* |
|  | (6.22) | (5.48) |
| *N* | 195 | 195 |
| *R*2 | 0.550 | 0.604 |
| adj. *R*2 | 0.545 | 0.586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第五，考虑到公司高管自身的教育背景会影响到公司整体的文化氛围，以及对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度，从而对公司的经营行为产生间接的影响，本文加入新的控制变量高管文化水平（Degree），数据及划分标准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中1=中专及中专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6=其他），计算出样本公司高管学历水平的平均数，作为衡量高管教育背景的标准，并加入原有控制变量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7，仍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4.4 内生性检验**

表4-8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  | Lnkm200 | Recovery | Recovery | Recovery |
| CMA | 0.0915\*\* |  | 0.131\*\* | -0.0357 |
|  | (1.98) |  | (2.54) | (-0.50) |
| Lnkm200 |  | -1.574\*\* |  | -1.613\*\*\* |
|  |  | (-2.21) |  | (-10.85) |
| \_cons | 1.859\*\*\* | 6.628\*\*\* | 2.094\*\*\* | 6.136\*\*\* |
| 控制变量  F值 | (4.32)  Yes  22.12 | (4.40)  Yes | (15.91)  Yes | (15.97)  Yes |
| *N* | 195 | 195 | 195 | 195 |
| *R*2 | 0.276 | 0.595 | 0.046 | 0.550 |
| adj. *R*2 | 0.249 | 0.580 | 0.041 | 0.545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借鉴徐细雄和李万利等（2019）内生性检验的方法，我们使用公司所在地一定范围内贞节牌坊的数目(CMA，加1取对数)作为工具变量，以最小二乘法的方式进行两阶段回归。本文选择这样独特的变量，是因为贞节牌坊受儒教的名节观念影响较大，与本文自变量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紧密相关，但它与本文研究的因变量财务困境恢复的关联性不大。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见表4-8，其中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在列（1）中显示，工具变量（CM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贞洁牌坊（CMA） 与儒家书院（Lnkm200）之间在 1% 的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贞节牌坊的数目显著地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且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为22.12，大于10，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

第二步回归结果如列（2）显示，对内生性进行控制以后，儒家文化（Lnkm200）的回归系数仍处于显著性1%的显著水平。进一步地，我们对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进行了验证。首先，用因变量（Recovery）与工具变量（CMA)进行回归，其结果见（3）栏；随后，将自变量（Lnkm200）和工具变量（CMA）与因变量（Recovery）一起进行回归，其结果见（4）栏。我们发现，在第3栏中，工具变量（CMA）的显著性仍很高，第4栏的自变量（Lnkm200）也仍显著，但是工具变量（CMA）则不存在显著性，说明CMA只通过Lnkm200与Recovery相关，且外生性良好，作为工具变量比较合适。

**4.5 拓展研究**

1）分组回归

表4-9 分组回归结果

|  |  |
| --- | --- |
|  |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
|  | Recovery Recovery |
| Lnkm200 | -1.490\*\*\* -1.032\*\* |
|  | (-12.41) (-3.86) |
| Growth | 0.170 -0.444\* |
|  | (0.90) (-1.89) |
| Indep | -1.988 5.432 |
|  | (-1.26) (1.42) |
| Duality | -0.314 0.466 |
|  | (-1.49) (1.16) |
| Gdp | -0.0160 -0.0405 |
|  | (-0.76) (-0.10) |
| CapCity | -0.276 -0.216 |
|  | (-1.29) (-0.56) |
| Uni | -0.176\*\*\* -0.0572\* |
|  | (-2.72) (-0.46) |
| \_cons | 7.287\*\*\* 2.883\* |
|  | (10.90) (1.94) |
| *N* | 126 69 |
| *R*2 | 0.759 0.337 |
| adj. *R*2 | 0.745 0.261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为了丰富我们的研究，参考金智（2017）,本文将样本分成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两个组，对公司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对财务困境恢复Recovery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列示在如下表4-4的(1)和(2)列中，结果表明，Lnkm200 变量在国有企业组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在非国有企业组不如国有企业组的结果显著。这意味着，由于所有制等原因，国有企业被政府持股，且企业的主要高管大部分由政府委派，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受到行政力量以及主流文化的制约会更强，因此公司财务困境恢复能力受儒家文化的负向的影响作用相比之下会更有可能发生在国有性质的企业。

2）DID双重差分模型

一直以来，节俭都是根植于中国人价值体系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消费升级，过度奢侈浪费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与企业经营中日益严重。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八项规定”。尽管它的重点对象是政府部门，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八项规定”中，勤俭节约、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规定，均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节俭意识相符。因此我们预期，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的地区的企业，会更容易接受“八项规定”，因此可能减少公司现金流的浪费，从而从困境中恢复的越快。

为了对这一猜想进行验证，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检验：

第一步，以儒家文化影响程度的中值为界将样本公司分为儒家文化浓厚组和儒家文化薄弱组两组，treat值分别设置为1和0；然后，再使用变量post，在2012年之后取1，2012年及之前取0。 由于两个变量分别控制了财务困境恢复的组间差异和“八项规定”对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treat×post的系数来分辨在“八项规定”实施之后，困境恢复情况在两个儒家文化影响程度不同的分组之间变化的差异。 表4-10为对样本公司进行检验的结果， treat\*pos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示在“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儒家文化影响程度更深的地区，困境企业恢复的平均时间更短，与本部分的设想一致，同时再次证实了本文的主要结论。

表4-10 机制检验：节俭意识

|  |  |  |
| --- | --- | --- |
|  | (1) | (2) |
|  | Recovery | Recovery |
| treat | -1.910\*\*\* | -1.604\*\*\* |
|  | (-4.44) | (-3.94) |
| treat\*post | -1.707\*\*\* | -1.182\*\*\* |
|  | (-8.03) | (-5.84) |
| post | -0.109\* | -0.398 |
|  | (-0.37) | (-1.08) |
| Growth |  | -0.205 |
|  |  | (-1.25) |
| Indep |  | -0.522 |
|  |  | (-0.29) |
| Duality |  | -0.142 |
|  |  | (-0.62) |
| Gdp |  | 0.0200 |
|  |  | (0.88) |
| CapCity |  | -0.504\*\* |
|  |  | (-2.26) |
| Uni |  | -0.260\*\*\* |
|  |  | (-3.81) |
| \_cons | 3.600\*\*\* | 4.399\*\*\* |
|  | (10.30) | (5.72) |
| *N* | 195 | 195 |
| *R*2 | 0.374 | 0.486 |
| adj. *R*2 | 0.364 | 0.461 |

*Robust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文化、经济、金融的交叉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对它们的研究对于发掘和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选择儒家文化这一个文化的核心，以儒家文化中“俭”的思想的视角出发，探讨儒家传统对于企业财务的功用。本文以公司办公地周围200公里范围内的儒家书院的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检验并使用企业现金流比率作为中介机制以测度“俭”的思想，探讨儒家文化中“俭”的思想理念对于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儒家文化能显著促进企业的财务困境恢复。随后的机制分析证明，儒家文化中“俭”的思想主要通过企业现金流的机制影响财务困境恢复。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公司越可能受到节俭的道德约束，由此减少现金流的支出或者提高现金流的使用效率，从而加快财务困境的恢复。此外，在分组回归中，我们还发现，是否为国企影响儒家文化发挥作用，即在困境公司是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儒家文化对财务困境恢复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在控制一系列变量后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也都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5.2 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如下理论和政策意义：

（1）儒家传统能通过促进企业现金流比率的提高，加快财务困境企业的恢复速度，本文提供了儒家文化服务实体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的经验证据。

（2）应鼓励和支持传统儒家文化被纳入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在节俭、谨慎、自律等方面发挥独特的积极影响，提高企业现金流的使用效率，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在法律制度相对薄弱的地方，更应该助推传统文化与正式制度相互补充、促进，以儒家思想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陷。与强制实施的严格制度不同，文化更易为市场参与者所接受，因为它的人文情感和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这也表明，在建立正规体系时，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引导市场行为，形成正规和文化相结合的灵活管理方式，从而提高各种政策措施的执行效率和成效。

（3）新兴的市场一般情况下很难有完全健全的正式制度，想要达到对市场经济的全面协调也难度较大，更何况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种环境下，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本文讨论的文化，可以被利用到市场机制与体制中，改善市场的资源配置(金智，2013)。但是文化因素又很容易被多个主体所忽略。这对我国政府在构建新型监管机制、减少对企业正常运营行为的干预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管理者，他们要认清文化因素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进而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的经营，从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合适的管理。在当今国际化竞争日逐步激烈的环境下，企业应该在搞清自身的文化氛围与特点的同时，防范文化融合可能造成的风险。对制订政策和实行监督的监管机构来说，有必要考察制定的制度能否与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企业的行为准则相适应，以便该规则能够起到预期的作用。最后对研究者来说，当他们研究的市场是一个制度建设尚未完善的新兴市场时，就必须要将企业的文化要素考虑到范围之内，才能更好地将企业文化与正式制度相结合地去理解他们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才能让我们对企业行为有更加全面、深刻的感悟和理解。

（4）文章从微观企业的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推动公司摆脱财务困境的内在机制和实证，并纠正了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价值观的负面认识。这说明我们不应一味地否认儒家思想的经济价值，而应客观地、多角度地看待儒家文化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进而在新世纪使这种文化能够得以继承和发展。

（5）习总书记在讲话上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要坚持文化自信。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在我国非正式制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中我们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研究，发现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俭”，对于困境公司的财务状况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从而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时代意义和作用。所以，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多从这些方面寻求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 致谢

高中毕业时唱的歌“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写到这里时又在耳边回荡起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很多譬如朱颜、繁花的美好事物总是匆匆逝去，我快乐的四年大学时光也转眼间就接近尾声。这无情的时光就像一阵倒春寒中的冷风，吹走了枝头的繁花，但我不愿停下，相信只要陪着它一起赶路，入秋以后也可以硕果满枝。

最近看到一句很喜欢的话：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我想，大学四年赋予我的远不止知识与技能，更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恶劣，我都学着去从容面对。

当然，在我变得更强大的路上，少不了身边人的支持与帮助。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甘煦老师，虽然我们认识不算久，也还没来得及上过您的课，但是你就像姐姐一样，给我学业和未来规划的建议，给我鼓励和信心。拥有一个交流完全无代沟的美女老师简直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把我捧在手心，一有需要会立即出现，同时又给我独立的空间，义无反顾支持我的任何决定，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是我无忧无虑的底气。

还要感谢这四年里遇到的一起奋斗过的同学、朋友，平日里一起追过的剧、备考时一起刷过的题，都将是我青春纪念册里永不褪色的美好回忆。

最后感谢我的室友，我换过三波室友，现在分别在七个专业，感谢你们让我领略了不同专业的特色，未来我们也一定会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最后的最后，要感谢这四年一直没有停止奔跑的自己，从来不会轻易放弃，虽然暂时没有达到最满意的目标，但是谢谢你坚持走到这儿，接下来也要继续热爱生活，变得更勇敢！

王禧月

2022年 5月1日

# 参考文献

[1] Altman EI, Haldeman RG, Narayanan P. Zeta analysis: a new model to identify bankruptcy risk of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77 ,1:29-54.

[2] Li，K. ，D. Griffin，H. Yue，and L. Zhao. 2013. “How does Culture Influence Corporate Risk － Taking?”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3( 4) : 1 ~22.

[3] Du，X. “Does Religion Matter to Owner-Manager Agency Cos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118，pp. 319－347．

[4] Du，X. “Does Confucianism Ｒeduce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5，132( 4) ，pp. 661－716．

[5] Du，X. “Does Confucianism Ｒeduce Board Gender Divers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6，136( 2) ，pp. 399－436.

[6] Allen，F. ; Qian，J. and Qian，M. “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 1) ，pp. 57－116．

[7] Beaver, W., 1966, “Financi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Failure”, Supplement to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pp.71-111.

[8] Carmichael, D.R., 1972 , “The Auditor' s Reporting Obligation” , Auditing Research Monograph No.1 (New York:AICPA), pp.94.

[9] Ross B. Financial Ratios and Different Failure Processe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2000

[10] 诸葛亮.《诫子书》

[11] 方颖, 郭俊杰. 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是否有效:基于资本市场反应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8, 53(10): 158–174

[12] 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 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3第7期

[13]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陈才东，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14] 程博、潘飞、王建玲：儒家文化、信息环境与内部控制，会计研究2016年第12期

[15]吴世农,卢贤义.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J].经济研究,2001(06)

[16] 徐细雄、李万利. 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 金融研究. 2019, (09)

[17] 尹斌.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因素研究. 会计之友. 2012, (17)

[18] 董保国.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影响因素研究. 厦门大学, 2009, 第12期

[19] 姚珊珊, 沈中华. 政治关联、银行关系与财务困境恢复——基于中国ST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 2016, (09)

[20] 姚珊珊. 政府补助与企业财务困境恢复——基于ST上市公司“摘帽”的实证分析. 经济研究参考. 2015, (68)

[21] 董保国.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影响因素研究. 厦门大学, 2009, 第12期

[22] 李金波、聂辉华. 儒家孝道、经济增长与文明分岔，《中国社会科学》2011第6期

[23] 马若微、魏琪瑛. 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研究,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0(03)

[24] 古志辉、张永杰、孟庆斌. 儒家如何影响股利政策?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0, 40(09)

[25] 李鑫. 儒家文化与大股东掏空. 暨南大学. 2021年第04期

[26] 古志辉. 全球化情境中的儒家伦理与代理成本，《管理世界》第3期, 2015第 113-123 页

[27] 金智、徐慧、马永强，2017，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世界经济》第 11 期，第 170-192 页

[28] 李彩玲，林东杰，总经理儒家文化观念与公司诉讼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问卷调查数据，管理学季刊2019年第4期

[29] 王兴元. 论儒家创新创业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企业经济. 2021,40(12)

[30] 陈晓、陈治鸿. 企业财务困境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投资研究. 2000,(06)

[31] 章之旺. 预期财务困境成本在债务违约预测模型中的信息含量.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03)

[32] 张金昌. 财务困境预警:概念界定与理论辨析. 财经论丛. 2020, (12)

[33] 雷康弘,文凤华. 公司治理结构特征与困境公司恢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财务与金融. 2014, (06)

[34] 潘越、宁博、纪翔阁、戴亦一.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７期

[35] 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新夫：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经济研究2013年第９期

[36] 修宗峰、周泽将：商帮文化情境下民营上市公司业绩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管理学报2018年第９期

[37] 许纪霖：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南方周末（广州）2014年９月４日

[38] 张维迎．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

[39] 陈仕华，杨江变，杨周萍，等．儒家文化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财贸研究．2020

[40] 周首华.论财务危机预警分析-F分数模型[J]. 会计研究, 1996,(8):8-11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题 目 儒家文化与财务困境恢复

——基于“俭”的视角

（任务起止日期：2021年11月2日～2022年 6月5日）

院 系 管理学院

专业班级 财务管理1802班

姓 名 王禧月

学 号 U201816465

指导教师 甘煦

教研室（系、所）负责人 2021年 11月2日审查

院（系）负责人 2021年 2月 21日批准

|  |
| --- |
| 课题内容：  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每一个上市公司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一些公司能抓住机遇避开风险迅速地发展壮大;而另一 些公司却因缺乏竞争力或经营不善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走向破产。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后，不仅严重制约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而且还会给股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害。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因素，并为财务困境公司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帮助公司尽快走出困境显得尤为迫切。     传统文化通过影响个体性格、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影响着个体行为，进而对社会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因而，传统文化既可以直接通过影响公司员工与管理层而作用于公司治理，也能够通过影响商业伦理间接影响公司决策行为。     本文从传统文化角度切入，基于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流派—儒家文化探讨企业中的儒家文化因素对企业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儒家文化的作用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将选取若干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省际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上市公司儒家文化氛围是否会影响企业财务困境状况，及如何影响企业财务困境的恢复的具体影响路径。同时，本文将采取不同的衡量指标对回归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使文章实证结论更具说服力。 |
| 课题任务要求：  目的: 1、毕业设计是本科专业教育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是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论文写作能力以及论文答辩的表述能力的综合训练过程。 2、毕业设计(论文)是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践技术的手段，是理论结合实际、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必经之路。 3、撰写毕业论文是对完成毕业设计的实现过程的总结，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以提高学生具体技术上升到理论认识的能力。 4、认真完成毕业设计是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的必要的一环。 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字数不少于1.5万字，外文翻译不少于5千汉字(或2万印刷符)、外文参考资料阅读量不少于10万印刷符。文科各专业的文献综述必须单独写，其字数应在3千汉字以上，要求与译文相同。 |
| 主要参考文献（由指导教师选定）：  [1]徐细雄，李万利，《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金融研究,2019(09)  [2]金智、徐慧、马永强，2017，《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世界经济》第11期，170-192页  [3]陈颐，《儒家文化、社会信任与普惠金融》，《财贸经济》第4期，2017  [4]王文艺，《产品市场竞争、两职合一与财务困境恢复研究》，《现代经济信息》第8期，2018.  [5]马若微，魏琪瑛，《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5,30(03)  [6]尹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恢复的影响因素研究》，会计之友. 2012,(17) |
| 同组设计者：无 |
|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